

# 论1921年 北京国立八高校教师索薪运动

向仁富

(四川师范大学 历史系, 四川 成都 610068)

**摘要:**20世纪20年代初,北洋政府政局动荡不安,财政极为困难,教师工资严重拖欠,教育事业难以为继。1921年,北京国立八高校教师发起大规模的索薪运动,在社会上造成了极大反响。尽管北洋政府对其持敌视态度,但它仍得到社会各阶层人士的深切同情和大力支持。

**关键词:**1921年;北京;国立八高校;教师;索薪运动

**中图分类号:**K258.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5315(2002)04-0097-08

北洋军阀统治时期,尤其是五四运动以后,北京政府中央如陆军部、海军部、司法部、内务部等部门,地方如安徽、江西、福建、河南、湖南、湖北、四川等省份的许多部门都因薪饷拖欠而发生索欠事件。其中,教育界索薪尤为引人注目。作为“首善之区,观瞻所系”的北京八所国立专门以上学校——北大、高师、女高师、法政专门学校、医学专门学校、工业专门学校、农业专门学校、美术专门学校(以下简称“八高校”),因为教育经费短缺、教师工资严重拖欠而爆发了声势浩大、历时达数年之久的“索薪运动”。此次运动绝非简单的经费问题,它涉及到当时政治、经济、军事乃至外交等方面,在社会上亦产生了很大的反响。对于这一问题的研究,有助于我们从一个侧面透析北洋军阀统治时期中国高等教育的情况。到目前为止,笔者尚未发现讨论这一问题的论著。鉴于此,笔者拟对1921年北京国立八高校索薪运动略作探讨。

—

“教育为立国之本,经费为教育命脉。”[1](259页)弄清当时北京国立八高校经费情况有助于分析索薪运动爆发的原因。

1921年,在发起索薪运动之初,八高校教师坚持要求政府“月拨国立北京专门以上学校经费二十万元”[2](151页)。它是八高校在经费预算“忍痛让步”[2](152页)的基础上提出来的一个方案。当时八高校经费具体情况见表一[2](152页)。

收稿日期:2001-10-20

作者简介:向仁富(1971—),男,四川省三台县人,四川师范大学历史系98级硕士研究生,指导教师杨天宏教授。作者现为广东商学院教师。

表一. 北京国立八高校经费预算表

(单位:元)

学校	1919年		1920年	
	经常费	临时费	经常费	临时费
北大	733840	58619	798960	158619
法专	116200	5581	149040	10000
医专	118800	23440	161192	74800
工专	133704	40000	165918	96564
农专	100080	24000	124568	31000
高师	417320	30000	524788	248500
女高师	145622	50000	222535	365400
美术	42480	4700	68760	38000
总计	1809106	236340	2215761	1012883

这只是八高校经费预算情况。实际能否得到此数,并不能确定。每月20万元经费,“实非苛求”。即便能兑现,也不过仅可“敷衍一时”[2](152页)。

更让教育界人士不满的是:即使这点难敷其用的教育经费也仍然得不到切实的保障。这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首先是无固定的教育基金。“国本安危,端在教育,教育振兴,首尚基金。基金确定,虽政潮起伏,军务倥偬,而教育尚可继续进行”[3]。但是,由于政府缺乏诚意,没能筹得教育基金[4],致使教育随政局动荡而难以维持。其次,教育经费不能足额按时发放。八高校总的教育经费偏少,然而即使这点难敷其用、微不足道的经费,政府也“往往任意拖延,多不按期核放,稍有事故,籍口停发”[1](259页)。教师的工资有时只能拿到一、二成,许多教师只得靠借债度日,或者四出兼课,以保生计[5](64页)。事实上,很多时候,教师罢课索薪皆因政府拖欠教育经费所致。再次,教育经费不时被“挪作他用”。典型的例子是1921年4月,由交通部协济之教育款项,因当局挪充作曹(锟)张(作霖)来京的招待费用,致使教育经费无法拨付而酿成“六三惨剧”[6](527页)。

教育经费短缺直接影响学校教师的待遇。1917年5月3日,北京政府教育部颁布国立大学职员任用及薪俸规程令。

现将教职员薪俸等级[7](166页)列如表二、表三。

表二. 国立大学职员薪俸表

(单位:元)

级别	校长	学长	图书馆主任、教务主任、校医	一等事务员	二等事务员
第一级	600	450	200	100	60
第二级	500	400	180	90	50
第三级	400	350	160	80	40
第四级		300	140	70	30
第五级			120		

(注:独立一分科之校长,其薪俸按照学长级支給,但其最高级得进至500元。)

表三. 国立大学教员薪俸表

(单位:元)

	正教授	本科教授	预科教授	助教	讲师	外国教员
第一级	400	280	240	120	每小时 2 元至 5 元	薪数别以 契约定之
第二级	380	260	220	100		
第三级	360	240	200	80		
第四级	340	220	180	70		
第五级	320	200	160	60		
第六级	300	180	140	50		

从上表可以看出:如果教师工资全部兑现,当时教师中也确有经济宽裕者,比如获得校内高级领导职务和教授职称者的薪俸就较高,但是,他们毕竟为数不多,因而教师仍以“寒士为多”[8],教师待遇整体偏低。

当然,这一切都“事出有因”。

第一,中央财政入不敷出,国家总的教育经费偏少,这决定了当时八高校教育经费也不可能宽裕。北洋军阀统治时期,各省军阀割据,战争频仍,中央政府财权旁落,财政入不敷出。这表现为:一方面,各部把经费当作私产,互不统属[9];另一方面,田赋、货物税、盐税等收入被地方截留,中央所得无几,且自 1918 年以后各省不再向中央解款[10](68—69 页)。1919 年,北京政府岁入数为 4.39 亿元,岁出数为 4.96 亿元,财政赤字达 0.57 亿元<sup>①</sup>。事实上,除 1914 年北京政府收支平衡、略有盈余外,其余年份均是支多收少[10](67 页),财政赤字严重。北京政府的大宗开支是军费和债务费。1919 年,北京政府军费支出达 2.172 亿元,占岁出总额的 43.8%;债务费为 1.28 亿元,占岁出总额的 25.8%;两者合计,共占岁出总额的 69.6%[11]。1920 年 7 月,直皖战争爆发,军费支出更是有增无减。如此一来,剩余经费中用来维持教育事业的数目当然就微不足道了。1919 年,全国教育经费仅占国家预算的 1/75[12](184 页)。教育经费占国家总收入的比例,真可谓“不及九牛一毛”[2](156 页)。

第二,政争激烈,政局动荡不安,给教育事业带来了严重危害。“教育事业,各国视为国家生命之根本;故对于经费之筹画,实为行政上重大之职务”[13]。行政机关欲真正切实负起责任,没有一个较为稳定的政治环境,几乎是不可能的。然而,在北京政府统治的 12 年内,内阁先后存在 45 届[10](106 页),仅 1920—1921 年就先后存在了 5 届内阁。其中,靳云鹏先后两次出任国务总理,最长执政时间不过半年[10](111 页)。可见,当时政争之激烈,政局之动荡。政争分为军人争权和政党争权两种,两者都给教育事业带来危害。“因军人争权,遂有激烈竞争军备,强横索取军费之现象。中央政府复不能抑制之,致令全国军费为数极多,产业教育经费但感不足焉”。教育经费同军费相比,两者相去甚远。尽管军费“动愈数百万”,但是“各疆吏予取予携,政府无不预为筹划”。而对教育经费,政府却“置而不问”[6](527 页),造成教育经费难以为继。因政党争权营私,“遂见内阁各部零乱不一”。例如,“交通部收入丰富之机关,现均为有力政党所盘踞,专供其谋本党之便利”。由于财政部不能统筹全国一切收入,自不能适当分配于各部,“故每遇财政困难时,即发给官吏薪俸,亦生大不公平。如交通与教育两部官吏,虽同为政府之官吏,而发给薪俸之中,既有现与钞、多与寡之不同,复有发给时期之差异。其次,如国立各校之薪俸无款发给,交通部则有款设立大学”。这是各校教职人员激昂奋发,起而同盟罢课索薪的重要原因。时人已清醒地认识到这一点,“政府置教育不顾,乃政争之结果”。“凡政治宜统筹全局,融为一体,必须由全国治安发达之见地,适当分配国库收入。若分配不得其当,收入多之机关,即专擅其收入,徒兴不急之事业,而不支付其他紧急事业之经费,则是跛行政治。纵得见一部分之发达,而阻害全体之发达,则于国家人民,将毫无所得。现在中国之政治,实毙于此种弊害。如教育部常被虐待,教长屡陷于穷地者,即职是固也。而究其祸根,固皆发生于政客政党之争权营私也”[14]。可见,政党争权、政事不一是教育界起而索薪的重要原因。

第三,政府部门与教育部门不能契合,政府部门不愿为维持教育事业而努力。时人云:“盖现在之教育界与政界,全然异其思潮。两者之间,既无何等联络,亦毫无亲密之感情。教育界内之指导者,多为新思想家<sup>②</sup>,彼等视国家为人民全体之共同团体,因此政府不得作为人民之事务所。如现在政府,固非彼等所认为政府者也。盖现在政府,无代表人民之国会,其行政司法,皆非出于人民之公意,不过为寡头政治而已。彼新思想家,何能认如此政治为政治,更何能认如此政府以为政府耶。夫现在政府,既非受有国民之委任,所谓政府者,不过为政界有力特殊阶级之事务所,则彼等所视为国家者,非属于国民全体,乃属于特殊政治阶级之事务所,由此见地,教育界以学校为国民全体之机关,而政府方面,则以学校为政治阶级之机关。两者之间,既掘有如此大沟渠,则其不能互相协同,以经营事业者,自属当然之理也。”因此,就教育界那些“有力者”而言,“不欲现在政府之存续,宁希望其颠覆”,并且极力将这种思想注入学生脑中。就政府方面而言,“其心理,谓学校存立,自必支出费用。而其结果,仅以养成自己之仇敌”。两者之间,“存有是种沟渠,故政府纵经营教育事业,仅以粉饰表面,至经费支出之点,则不热心,其故盖即为此也”[15]。

由于“五四”、“六三”等爱国运动肇端于教育界,军阀政府便把教育界视为祸首,置之于敌对地位。“从前以教育为内政之一而竭力进行者,自此而后,则唯恐其或有起色,以与政府为难”[1](258页),故“摧残之破坏之唯恐不速”[2](164页)。在这种情况下,在北京政府心目中,教育事业不可能占有较高的地位,教育界也势必处于一种缺钱的尴尬境地。

此外,教育部门同其他行政部门一样存在着严重的腐败现象。诚如蔡元培所说:“十余年来,教育部处北京腐败空气之中,受其他各部之熏染,长部者又时有不知学术教育为何物,而专务营私植党之人,声应气求,积渐腐化,遂使教育部名词与腐败官僚亦为密切之联想。”[16](319页)这更让教育事业雪上加霜。

可见,北京国立八高校教师索薪运动爆发的原因十分复杂,上述几种因素都直接或间接地发挥了作用。

## 二

北洋军阀时期,教师欠薪,并非始于1921年。“自五四而后,教育经费积欠日多,教育界感着生存上的需要,常常用罢课停职种种方法对待政府”[1](258页)。1919年冬,教师因索发现金而罢课。是时,“北京中国、交通两行停止兑现,至十二月价格不及兑折,京中公立教职员所得薪俸,多为纸币,致生活大感困难,屡次要求发现而不得,乃于十二月十五日一致罢课。但因财政困难与政府对教育无意维持两重原因,卒无圆满解决”[1](258页)。1920年上半年,教育部拖欠一个月的薪金,下半年则一拖几个月,到年底才把9月份的薪金发全[17]。同年,全国教育联合会召开会议,提出了教育经费独立的议决案,谓“应由中央先行划清教育经费,并令行各省区长官督饬财政、教育机关妥筹办法,统计每年该省区教育经费共需若干,于最短期内妥为区处,专款存储,按时发放。无论遇何紧要事情发生,均不准挪用,以示限制。庶经费确定,教育可期进步”[1](259页)。

1921年是北京八高校教师大规模索薪的第一年,它在某种程度上决定了以后索薪运动的走向,因而颇为引人注目。1921年的索薪运动可分为两个阶段。

第一阶段大致从1921年3月至4月底,为保障教育经费,北京国立八高校教师与政府展开了斗争。截止3月上旬,八高校教师薪俸积欠已达三个月之久,北京教育已现危象[18]。3月12日,北京高等工业学校召开教职员大会,会议结果之一为“嗣后拟将教育事业归之公共管理。……如此,则教育事业可以离部而独立,庶几一劳永逸”。3月13日,在北大教职员会议上,陈世璋提出:要求政府一方面指定的款,一方面补发积欠,并以罢工为后盾[9]。3月14、15日,八高校相继罢课。3月16日,八校教职员联合会发表停职宣言,称:由于经费缺乏,“添聘教员没有钱,购买书籍没有钱,购买仪器没有钱,购买试验用的化学药品没有钱,乃至购买一切用器都没有钱,学生终日惶惶,觉得学校停闭就在旦夕,不能安心求学。教职员终日惶惶,迫于饥寒,没有法子维持生计,亦不得安心授课”。如果政府还有维持教育的意思,政府就要从现在确实的收入中,如“国家所办的铁路、邮电等项内,指拨一点点定数,作教育经费,并须确实地保障不得挪用或减少”[19]。3

月 18 日,八校教职员再上书府院,云“近年以来,即学校教育一端,不特无进步之可言;且因经费不给而辍弦颂者,京内京外,此仆彼继”,集议要求在铁路、邮电项下月拨国立北京专门以上各校经费 20 万元[20]。

虽然索薪运动蓬勃兴起,徐世昌北京政府仍然以敷衍塞责的态度对待之。为此,八高校教师于 4 月 8 日全体辞职。4 月 12 日,八校 2000 余名学生赴国务院、总统府请愿。15 日,由于政府裁减有限的教育经费,八高校校长向教育部辞职。19 日,北京各中学为声援八校而罢课。与此同时,八高校学生发起了读书运动。30 日,北京政府迫于形势,被迫接受了八高校教师的条件,并议决办法三条。

其一,自 4 月份起,财政部同意,在未筹有的款及确实保障方法以前,由交通部每月尽先拨付财政部特别协款 22 万元,充作北京国立专门以上八校及北京师范大学公立中小学每月经常临时各费。此款由财政、交通、教育三部订明,不作别用。俟财政部筹有的款,或教育基金筹足时,前项协款即行截止。

其二,其他教育部应向财政部额领之款(以向来额领之数为准),由财政部筹定拨付。

其三,民国 9 年 12 月份起至本年 2 月份止,八校及中等各校积欠经费约 40 万元,先拨付 1 个月,与本年 3 月份经费同时并发,其余分为三期,由银行担保,于 4、5、6 三个月各付一期[2](159 页)。

八校教职员对于阁议三条,“本来不能够十分满意,惟念青年学子于读书的念望非常的迫切”[2](160 页),所以议决自 5 月 3 日起暂允留职。

第二阶段为 1921 年 5 月至 7 月底,斗争的焦点为维护教育界人格。阁议三条似乎使教育经费有了保证,问题可以得到解决。然而,不如意事常八九。时隔不久,波澜又生。

1921 年 5 月 10 日,署理内阁总理靳云鹏正式担任内阁总理。4 月 30 日阁议所定的 5 月应发八高校教师的 4 月份经费及补发积欠的一部分的条款,靳云鹏内阁未能履行。5 月 16 日,国立八高校校长再次上府、院、部辞职,称:“窃自教职员停职已来,为时已届两月,校长等虽任劳任怨,在所不辞,惜力尽声嘶,毫无效果。值兹学年届满,应行照章结束,与秋季始业应行筹备事宜,在在俱关百年大计,稍有疏虞,贻误匪浅,校长等绠短汲深,难资策励,与其坐误事机,曷若引咎辞职。”[21]同日,八校教师亦发表《辞职宣言书》,谓:“京师教育经费困难,不自今日始,学校苟延残喘,学术自难进步。建筑无费,购书无费,置备仪器及一切学校行政无费,设备不全,学生求学,徒恃形式,具学校之形式,乏学校之精神。阁议四月三十日数条办法,由于政府无意遵循和维持,只是徒具形式,各校教职员奔走两月,毫无成果,至此,只好辞职。”[21]

5 月 19 日,国务院发出致教育部 961 号公函,云:“经国务会议议决,以该八校迄未开课,所有八校教职员薪费应暂行停发,由财、交两部查照前议,储款以待,俟各该校实行开课后再行照发。”[6](536 页)该公函完全颠倒了事情的因果,激怒了被欠薪的教师。22 日,八校教职员发布《全体辞职宣言书》和《敬告国人书》。《辞职宣言书》称:“迨阅报章传布之十九日国务院致教育部第九百六十一号公函,始知政府更以其不诚实之惯性,施其遮掩、拖延、挑拨之手段,自盖其对于国人之失信,复厚辱吾辈之人格。”于是决定全体辞职[21]。《敬告国人书》云:“十载以来,祸乱迭起,政象日就泯芬,强藩争为攘据,中国统一之局,久已荡然无存矣。当是时犹能萃全国精英于一堂,卓然以维系吾民族统一之精神于分崩离析之中,不致随政象而颠沛者,惟有教育事业耳。政府苟有维持民族统一之诚,对此民族精神所寄托之教育事业,宜如何尊重而保全之,使不致以政治上一时之乖离,祸及民族精神上永久之团结,则将来民族统一之惟一希望,亦正惟此维系民族精神统一之教育事业是赖。今也政府不惟不思设法以维持之,而反摧残之破坏之惟恐其不速,此殆民族精神灭亡之征。而尸其罪者固惟今日之政府也。虽然,政府纵欲破坏教育,而负保卫教育之责者,尚有吾全国国民在。而吾辈从事教育职业者,尤万不容默尔而息,坐视政府之灭亡教育而不救。吾人以为虽在被治于此摧残教育之政府之地,已无国家教育托足之所。然中国之大,终有为表现民族精神维系、统一文化之教育事业之所托足,即终有吾辈献身于教育事业之机会。况吾辈亦国民也,吾辈视教育为吾全民族之生命,吾辈为捍卫保存吾全民族之生命,虽为此摧残教育之政府所不见容,亦可以国民之资格,自起而为谋,以慰此多数学子喁喁之望。即不然,天空海阔,亦终有吾辈阐扬文化之所也。”[22]字里行间更浸透了八校教职员对北洋政府的强烈不满和对教育事业的满腔热情。

5 月 30 日,八校代表 50 余人,同赴教育部索欠。然而,没有结果。与此同时,学生界议决举行请愿,要

求政府偿还教职员积欠,解决教育经费问题[23]。6月3日,北京国立八高校教职员和学生一起赴总统府请愿,途经新华门时与卫兵发生冲突,遭卫兵殴打,马叙伦等数十人受伤。受伤的教职员随后被送到北京首善医院医治,然而政府却“密布警探,禁止慰问”[24],受伤的教职员相当于被监禁。马叙伦认为在此次事件中人格受到极大的侮辱,愤而绝食。为了防止事态进一步扩大,北洋政府力主缓和,以张一麟出面调停。经过反复磋商,政府和八校教职员达成协议。在政府方面对教职员慰问后,7月28日教职员决定复课。可见,这一阶段斗争焦点事实上已经转移到维护教育界人格问题上[24]。

由于政府再次施展拖延、敷衍的手段,到1921年底,教育经费仍然未得到完全解决,八高校仍然困难重重。

### 三

1921年,北京国立八高校教师索薪运动虽然主要由教师发起,但反响很大。运动开始不久,“全国呼吁,电牍盈篋”[6](522—523页)。

首先行动起来的是学界。4月10日,北京国立八高校学生呈请解决教师罢课一事,要求政府要么指定的款尽快恢复原状,要么颁布明令解散各校[6](522—523页)。4月17日,北京各小学教职员代表呼吁,为维护教育、巩固国本,请求政府迅筹的款[6](524—525页)。留日学生亦上书力争,愿为京师教育之后援,要求政府指拨的款,划定教育基金,巩固教育事业[25]。此外,山东学生联合会、安徽学生联合会、北京高师附属学校、北京教育会等都发出了类似通电[6](527—530页)。

其次,全国各地其他人士亦大力声援八校教师。上海人士群起声援北京八高校,要求政府采取切实办法维持北京八高校教育;吉林省亦电请维持教育事业;更有人主张全国民众联合起来和政府算账[26]。

再次,全国各地舆论对此事也作了大量宣传报道。《申报》、《大公报》、《晨报》、《京报》、《顺天时报》、《益世报》、《教育杂志》等对此次运动均有大量报道,扩大了影响。

“六三”事件发生,社会反响更加强烈。索薪事件不仅牵涉教育经费问题,而且牵涉到教师人格问题。此时,社会各界“群情愤激”[6](555页),抗议政府摧残师生。

6月6日,山东各校教职员联合会徐中晟等通电,称:“据报载府院卫兵殴辱学界,同人闻之异常愤骇。窃教育为立国根本,此次京中各校辍学数月,政府迄无维持之法,已属责无可辞,乃人民请愿载在约法,而卫兵等竟敢肆横暴摧残士子。似此情形,不惟目无法纪,且恐动摇国本,应请将滋事卫兵严行惩办,并迅速设法维持。”[6](554页)

嘉兴公民更是厉声痛斥政府暴行:“公等唆卫兵枪击教职员学生,天良何在,国法何在。巡阅使索款立予数百万无名色。教职员区区欠薪,催索数月,靳不发给。武人持手枪强索,不敢稍拂其意。教职员代表亦手求见,即纵兵包围,枪击刀刺,如捕大盗,是何居心。”[27]

此外,江苏省教育会、陕西省议会、山西省议会、浙江杭州教职员联席会议、上海复旦大学、南京国立高等师范学校、北京公立私立中学以上学校等也先后发电、呈书,表述了大体相同的内容[6](554—558页)。

当时的社会名流对此事亦发表看法。孙中山致电八校,请教职员们南下[27]。张謇亦发表通电,要求政府于“交通项下筹款划拨以立永久基础”[28]。

然而值得注意的是,在运动初期,一般民众对这次运动持冷淡、旁观态度。有人认为教育界罢课索薪打断了正常的教学秩序,影响了学生学习,“盖多数学生受此(索薪运动)影响,其损失诚不可以数字计也”,提出“教育必须维持,罢课不可长久”[29]。还有人体谅政府“苦衷”,对教师索薪持反对意见。其理由是:由于政局动荡,新上任之政府,“改造后时日尚浅,各部总长,尚未有决定就任者”,“内阁阵容未整”,因此教育经费问题尚未纳入计划。且因财政困难,“他种政费之支付,亦同迟滞”,希望教职员能“暂为隐忍”,认为教职员“竟窘迫政府以破坏教育,殊为吾人不取也”[30]。故时人说:“然我国国民,对此文化升沉之大问题,若仍袖手旁观,不实行监督政府之职务,一任政府摧残教育,而欲自列于文明国民之林,殆南辕而北辙矣。”[31]

在考察索薪运动的社会反响时,还不能不注意到政府当局的态度。大体上,北京政府对运动持诬蔑和敌视的态度。6月5日,京畿卫戍司令王怀庆用诬蔑不实之词诽谤八校教师行为:“教员等阳言复职,阴谋捣乱,领薪两月,授课无期。又复藉口条文字句,肆意刁难,故为延宕。似此情形,就令一切经费毫无蒂欠,势必别生枝节,延不上课。……各教职以经费清付无可藉词捣乱,遂有唆乱学生盘踞国务院,包围新华门,击伤马次长之暴乱行为。其为蓄谋构煽,有意破坏教育、破坏秩序已可概见。”[6](549页)段祺瑞对教师索薪更是极为反感,云:“尔辈……坐食民膏,反以乱国家之纪纲,实国民之蠹耳,良知尚存否。不必理。”[6](558页)

由于政治立场和利益关系不同,教师索薪运动引起的社会反响十分复杂。但是,在各种意见中,支持的意见始终占主导地位。事实上,规模如此巨大、社会反响如此强烈的索薪运动并没有完全达到预期目的。其原因何在?显然,解决这一问题的根本条件,当时尚不具备。1921年5月10日才正式担任内阁总理的靳云鹏,到同年12月18日被颜惠庆取代。一周后,颜惠庆内阁又被梁士诒内阁替代[10](111页)。政局如此动荡,政府自难顾及教育。同时,财政困难也依然困扰着北京政府。但是,经过1921年教师索薪运动,北京政府已不可能再对教育经费问题“置而不问”,不管其情愿不情愿,都必须沿着逐渐解决这一问题的路径走下去。事实上,1921年以后的划拨关余、盐余及德、法、英、俄等国退还庚款转为教育经费,既是各高校教职员工和学生力争的结果,也是北京政府被迫正视和解决这一问题的表现。

#### 注释:

- ①因1921年没有财政预算,故以与之最接近的1919年的财政预算为例。  
②蔡元培当时就是西方价值观念的有力倡导者。参见(美)列文森著《儒教中国及其现代命运》,郑大华、任菁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0年版。

#### 参考文献:

- [1]舒新城.近代中国教育史[M].民国丛书:第四编43[Z].上海:上海书店,1992.  
[2]舒新城.近代中国教育史料[M].沈云龙.近代中国史料丛刊:续编66辑652[Z].台北:文海出版社,1974.  
[3]京校力争教育费之进行[N].大公报(天津),1921-03-24.  
[4]因教育基金的运动 为国民及当局者进一言[N].晨报,1921-03-29.  
[5]清华大学校史编写组.清华大学校史稿[M].北京:中华书局,1985.  
[6]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第三辑“民众运动”[M].南京:江苏古籍出版社,1991.  
[7]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第三辑“教育”[M].南京:江苏古籍出版社,1991.  
[8]交通当局对于教职员之要求[N].晨报,1921-04-10.  
[9]京学界教育费独立之运动[N].申报,1921-03-15.  
[10]张静如,刘志强.北洋军阀统治时期中国社会之变迁[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2.  
[11]千家驹.最近三十年的中国财政[J].东方杂志,1934,(1).  
[12]蔡尚思.蔡元培学术思想传记[A].胡国枢.蔡元培评传[M].郑州:河南教育出版社,1990.  
[13]程其保.中国教育经费问题[J].教育杂志,1924,(8).  
[14]蔑视教育乃政争之结果[N].顺天时报,1921-03-18.  
[15]政府与学校不两立[N].顺天时报,1921-05-28.  
[16]蔡元培.大学院公报发刊词[A].沈灌群,毛礼锐.中国教育家评传:第三卷[M].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1989.  
[17]陈明远.鲁迅在北京和上海的住房[N].文汇报,2001-10-04.  
[18]北京教育之危象[N].申报,1921-03-09.  
[19]罢工中之北京教育界[N].申报,1921-03-19.  
[20]罢工中之北京教育界[N].申报,1921-03-21.  
[21]京学潮不可收拾[N].申报,1921-05-19.  
[22]京校教职员再辞职[N].申报,1921-05-25.  
[23]教育风潮之昨讯[N].晨报,1921-05-31.

- [24] 结束欠薪外之学潮趋势[N]. 晨报, 1921-04-21.  
[25] 各方面对教育破产之呼吁[N]. 晨报, 1921-04-12.  
[26] 教职员总辞职后之风潮[N]. 晨报, 1921-06-10.  
[27] 六三事件之各方面的影响[N]. 晨报, 1921-06-10.  
[28] 京教潮仍无望解决[N]. 申报, 1921-05-06.  
[29] 教职员罢业问题质疑[N]. 京报, 1921-03-24.  
[30] 教职员态度非过急躁耶[N]. 顺天时报, 1921-05-25.  
[31] 教育经费问题仍未解决[N]. 晨报, 1921-03-30.

## 1921 Salary-Demanding Movement by Teachers of Eight Higher Learning Institutions in Beijing

XIANG Ren-fu

(History Department, Sichuan Normal University, Chengdu, Sichuan 610068, China)

**Abstract:** The early 1920s witnesses the unstability of political situations and difficulty of finance of the Beiyang Government, which result in serious arrears of teachers' salaries and stagnation of education. In 1921 teachers of eight higher learning institutions in Beijing launch a large-scale salary-demanding movement with great social response. In spite of the hostile attitude of the government, it wins deep sympathy and strong support from every social statum.

**Key words:** 1921; Beijing; eight state higher learning institutions; teacher; salary-demanding movement

[责任编辑:凌兴珍]